

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的盛衰

陶德臣

(陆军工程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7)

【摘要】19世纪70年代至1917年,是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的繁荣时期。茶砖价廉物美,运输携带方便、俄国许多地区居民偏爱砖茶、俄国市场砖茶需求旺盛是推动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繁荣的三大主要原因。俄商砖茶厂与华商砖茶厂在生产方面各有特点。1918年后,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迅速衰落,主要原因是外销市场丧失,俄商砖茶厂停产,华商砖茶厂并未复兴。

【关键词】近代中国青(米)砖茶;兴盛;衰落;羊楼洞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5-0056-14

The Ups and Downs of Green (Rice) Brick Tea Production in Modern China

TAO De-chen

(Arm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LA, Nanjing 210007)

Abstract: From 1870s to 1917, it was a prosperous period of green (rice) brick tea in modern China.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green (rice) brick tea production in modern China were the low price and good quality of tea brick,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 preference of the residents in many regions of Russia and the strong demand for brick tea in the Russian market. The Russian brick tea factories and Chinese brick tea factories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production. After 1918, the production of green (rice) brick tea in modern China declined rapidly, mainly because of the loss of export market, the suspension of Russian brick tea factories, and the failure of Chinese brick tea factories to reviv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green (rice) brick tea; prosperity; decline; Yangloudong

2013—2014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正式授予湖北赤壁为中国青砖茶之乡、中国米砖茶之乡,说明青(米)砖茶原产鄂南,故乡在蒲圻羊楼洞,即今天的赤壁市羊楼洞。为此,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青砖茶、米砖茶。青砖茶是以黑茶为原料,经筛分、压制、干燥诸环节,形成的砖型紧压茶。米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直接压制成砖型的紧压茶。青(米)砖茶在鄂南诞生后,发展到汉口等地。1863年,俄商在鄂南产区设置工厂制造砖茶至1923年俄商回归中国市场购茶前,为羊楼洞及其附近青(米)砖茶生产的由盛转衰时期。其中19世纪70年代至1917年,是青(米)砖茶生产的繁荣时期。随着俄商砖茶厂对中国砖茶业的全面控制,中国羊楼洞青(米)砖茶生产走向衰落。由于近代中国砖茶年均90%以上销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进行外贸统制,定茶叶为奢侈品,禁止进口,砖茶外销市场顿失,砖茶工业遭受沉重打击,生产一蹶不振,于是陷入绝境。

【收稿日期】2021-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

【作者简介】陶德臣(1965—),男,历史学硕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

一、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繁荣的原因

19世纪70年代至1917年,是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的繁荣时期。之所以出现近代中国砖茶生产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是由下列三大原因决定的。

(一)砖茶价廉物美,携带方便

青(米)砖茶在俄国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最为低廉,携带非常方便,这一优点是其他任何茶类都无法比拟的。近代中国出口茶结构分为绿茶、红茶、砖茶,在这三类外销茶中,绿茶售价最高,其次是红茶,最后才是砖茶。砖茶出口价大约仅占红茶售价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只有绿茶售价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近代海关有记录的出口茶价格年代中,砖茶出口价一般不足10海关两/担,1906至1914年,价格稍高,年平均价格也仅超过10海关两/担,1915至1917年价格最高,分别是22.72海关两/担、20.29海关两/担、22.24海关两/担,这3年砖茶价格占红茶价格比重为55.00%、59.76%、68.35%,占绿茶价格比重分别为43.73%、40.66%、47.24%。可见,砖茶价格低廉是不争的事实^①。

俄国位于辽阔的欧亚大陆,气温低,有的地区很干燥,这样高寒干燥的环境对营养和保健提出了现实要求。喝茶有利于保暖,且能够提供必需的维生素等,对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十分必要。由于砖茶是一种紧压茶,体积虽小,但重量大,它美观实用,携带、运输方便,特别是在人稀地广的西伯利亚、中亚地区,与携带、运输散茶相比有很大优势,这些地区的居民都愿意接受砖茶。这是俄国民族喜爱饮茶尤其是青睐青(米)砖茶的重要原因。

(二)俄国许多居民偏爱砖茶

俄国早就有饮茶习俗。随着饮茶习惯的延续,俄国许多地区的居民都离不开茶尤其是砖茶。史料记载,西伯利亚居民普遍喜爱砖茶。19世纪早期的旅游者瓦西里·帕尔申说:“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无论你走到那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②俄国西伯利亚消费的砖茶是经恰克图进口的。俄国亚洲地区的居民同样嗜好砖茶,这里的砖茶则是从新疆进口的。砖茶在俄国与在中国西北地区一样,不但是饮用品,甚至也充当货币流通。

(三)俄国市场砖茶需求旺盛

正因为俄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居民都喜好砖茶,所以俄国市场每年销售大量砖茶。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世界上生产、销售砖茶的国家只有中国。1890年,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茶叶市场^③。这一局面的产生,主要得力于俄国对砖茶需求的持续增长。在俄销中国茶叶中,砖茶占据半壁以上江山。一方面俄国对“砖茶的需求很大”^④,另一方面中国砖茶的市场基本为俄商所垄断,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

表1 1879—1894年中国历年砖茶销俄数量及占中国砖茶出口总数比重一览表 (单位:担)

年份	1879年	1880年	1881年	1882年	1883年	1884年	1885年	1886年
输俄量	274779	232330	246821	218526	218652	244895	279243	360091
总输出	275540	232969	247498	219027	218744	244996	280112	361492
比重	99.7%	99.7%	99.7%	99.8%	99.9%	99.9%	99.7%	99.6%

① 程天绶译:《过去数十年间之华茶出口价格》,《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

② 渠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第57—58页。

③ 陶德臣:《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国别市场分析》,《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7页。

续表1

年份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1890年	1891年	1892年	1893年	1894年
输俄量	329311	406834	304474	292147	326859	317411	379784	395506
总输出	99.4%	98.6%	98.2%	98.3%	99.4%	98.2%	99.3%	100%
比重	331281	412642	310178	297168	328861	323112	382361	395506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报告统计。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8-1219页;及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8-99页。

从上表可知,俄国对茶砖有旺盛的需求,而且数量持续上升。由此不难理解,砖茶“都为供应俄人的需要”^①，“砖茶几乎是专门供俄国销场而制造的。”^②

由于以上三大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世界上除了俄国,没有其他国家对砖茶这样热衷追捧了。于是,中国每年生产的砖茶绝大部分销往俄国,销俄砖茶占到中国砖茶出口总量一般均超过90%。因此,砖茶生产的繁荣适应了俄国对这种茶类消费的特殊需求,这是消费刺激生产的鲜明表现及必然结果。

二、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繁荣的情况

虽然砖茶生产和销售早于砖茶厂的设置,但由于市场需求大增,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外销场特别是俄国市场对砖茶的旺盛消费需求,俄商和华商均设立砖茶工厂代替手工作坊进行生产。砖茶工厂的生产能力比传统手工作坊的生产能力更强,生产的产品更美观、结实,质量更好,成本也更低。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是促使近代中国砖茶生产能力大增,砖茶生产趋于繁荣,从而能够向市场提供更多砖茶产品。这是需求刺激生产,生产又反过来满足需求的良性循环。

(一)俄商情况

俄商砖茶厂是近代中国砖茶生产的晴雨表,当然其生产能力的增加也有一个过程。由于俄国对砖茶的强烈需求,经营砖茶生意,“可以获得厚利”^③,因而大大刺激了以俄国为首的外商在中国非法设立砖茶厂,加工制造砖茶,直接进行出口。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外国砖茶厂为俄国、英国投资,而俄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据说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砖茶工厂全都掌握在他们(俄商——引者)手中”^④。“砖茶贸易,遂为俄商所垄断也”^⑤。“茶叶是俄国对华投资最初的原因。俄国茶商在华设立了茶厂,购置了地产。以经营茶叶为主的俄人,开始侨居于华北某几个都市,如天津、张家口等处,由此将茶叶输到恰克图”^⑥。

俄商设立砖茶厂始于1863年的鄂南茶产区,羊楼洞是其设厂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了更多通商口岸,便利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茶叶的掠夺。1861年,距羊楼洞砖茶区不远的汉口开埠通商,大大刺激了俄商就近掠夺中国砖茶的野心。于是,恰克图的俄商立即南下汉口,抛开晋商,自开砖茶

① [日]水野幸吉:《汉口》,1907年,第136页。

② Commercial Reports, 1876年, Part I, 第64页。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8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8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6页。

⑤ 《光绪五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津海关贸易报告》,第268页。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3页。外国对中国近代砖茶工业的掠夺可参考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资本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缫丝、制茶工业》,均载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⑥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789页。

厂制销砖茶。“嗣汉口辟为商埠后,俄商始在湘、鄂两省内地产茶之区,设立茶厂,以便制造砖茶”^①。俄商设立内地砖茶厂的时间是1863年,地点为湖北羊楼洞、崇阳、湖南羊楼司。1876年的《海关关册》提到:“砖茶几乎是专门供俄国销场而制造的。直到最近几年才由俄国人监督在以汉口为出路的崇阳、羊楼洞及羊楼司等产茶区制造砖茶。”^②工厂设于1863年,可从下列资料得知:“前几年在边境市场上山西行庄大约有一百个,可是自从1863年俄国人自己在汉口开办企业以后,山西行庄的数目就缩减为六十或七十。他还说,在1864年俄国人学会了怎样制造砖茶,在1865年有半数以上的茶经由天津发往恰克图的砖茶,是俄国人自己在湖北内地加工制造的。”^③其实,1863年俄国“开办企业”的地点是“湖北内地”,而不是汉口。

俄商在湖北内地开设的砖茶厂大体有3个。1876年的《海关关册》提到,俄国人监督设立的砖茶工厂在湖北崇阳、羊楼洞、湖南羊楼司,这说明至少有3个砖茶厂。又说:“在过去两年间,有三家采用蒸汽机的砖茶制造厂已经迁至汉口租界或其附近。”^④这说明俄商砖茶厂开始迁至汉口的时间是1874年。俄商“泊乎光绪元年(西历1875年)并在九江、福州增设茶厂,翌年(西历1876年)乃将湘、鄂内地茶厂取消,而改建于汉口租界之内”^⑤。1875年,汉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称:“我说的三个烟囱,两个是俄国商人经营的砖茶制造工厂,他们已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来使用的那种笨重的压机。”^⑥1876年,《海关关册》则言:“本年度中汉口租界里建立了一家新的砖茶制造厂,还有第3家正在租界境外建造,这两家都是俄国商人的。”^⑦1877年,《海关关册》报道:“直到去年以前,工厂设于内地,茶末在那里收购,厂中雇的工人就住在厂的附近,厂房是普通中国式的房屋。”^⑧可见,俄商砖茶厂最后从产区撤退的时间为1876年。1875年,另一家砖茶厂已着手迁汉口,但《海关关册》的记载又是矛盾的。如1878年分的《海关关册》提及:“1878年,内地只有两家工厂——一在崇阳,一在羊楼洞——仍进行制造砖茶。毫无疑问,为了汉口是商业中心,为了与汉口有关的所有各国人士的一般利益,砖茶业不久便会全部转到汉口来的。”^⑨1879年,《海关关册》又道:“运销蒙古的砖茶的质量,最近十五年中制造方面很有一些变化。用木制压机将茶末压成茶砖的中国旧法,现在已几乎全被设在产茶区的工厂的蒸汽压机所代替了。”这几家砖茶工厂是1869年以前几个俄国商人在汉口附近的产茶区建立的。“自1876年以来,这些工厂都逐渐从内地撤退到汉口外国租界内建厂进行制造了”^⑩。综合各种资料可知,早期设于内地的俄商砖茶厂为:顺丰砖茶厂(1863年)、新泰砖茶厂(1866年)、阜昌砖茶厂(1874年)^⑪。在没有更多新史料出现前,内地砖茶厂迁汉口的时间定于1876年比较合适。

19世纪80年代,俄商汉口砖茶厂完全垄断了出口砖茶的制造,手压机也完全被蒸汽机所代替。早期设在产区的俄商砖茶厂虽用外国人监督生产,但技术仍是旧式的。1865年,《海关关册》提到:“他们从中国人手中收购茶叶、茶末等,然后他们自己进行制造砖茶,其制成的产品与本地中国人所制的品质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13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9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00页。

④ Commercial Reports, 1876年, Part I, 第64页。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8页。

⑤ 《光绪五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津海关贸易报告》,第268页。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13页。

⑥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5页。

⑦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6页。

⑧ 《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14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6页。

⑨ 《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14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0页。

⑩ 《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269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1页。

⑪ 资料分别来源于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236、第237、第237页。之所以资料均写设立地点为汉口,是将产区与汉口混为一谈。

相同,而成本较低。”^①1869年,《海关关册》解释说:“上一季大约有14个俄国商人,照管他们在距此(汉口——引者)百余里内的产茶区所开设的几个砖茶制造厂。他们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在内地居住会获得很大的好处。他们制造的砖茶,不仅远比中国茶商所制的品质优良,而且他们焙制包装的茶叶,在汉口市场上销售也很好,并直接运往伦敦。”^②到1871年,《海关关册》仍道:“俄国砖茶制造厂的成功,比1869年的成绩还要好。”^③但到此为止,仍未讲俄商砖茶厂到底采用了何种压机。1875年,情况起了变化,《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提到:“他们已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来使用的那种粗笨的压机。其中一厂所使用的机器是齐勒巴诺夫(Cherepanoff)自己设计的,非常地成功;另一厂的机器更精良,是在英国设计运来的。”^④到1876年,《海关关册》又曰:“但是最近两年内,有三个使用蒸汽机的制造厂已经迁移到汉口租界或其附近。”^⑤1877年,《海关关册》再论及:“现在汉口有四家砖茶制造厂,其中两家使用蒸汽机。”^⑥1878年,“有一家工厂已输入了一台水力压”,“汉口现有六家砖茶工厂,其中三家用蒸汽机”^⑦。1879年,《海关关册》论述道:“用木制压机将茶末压成茶砖的中国旧法,现在已几乎全被设在产茶区的工厂的蒸汽压机所代替了。”^⑧1881年的《海关关册》终于明确:“现在手压机已完全被蒸汽机所代替,最近又有一架专制小型砖茶的水力压机已装置起来了。”^⑨至此,手工制茶砖完全被机械化制茶砖所代替。1888年9月1日,《北华捷报》报道:“‘砖茶’全部皆用蒸汽机制造。”至1893年,“俄国租界有两家砖茶制造厂,另两家在英国租界,这是本埠最重要的工业机构了。三家成立于1892年以前,第四家成立于1893年8月。”^⑩20世纪初,俄商砖茶厂有6个。“制茶业仍由俄国商人经营。他们所办的砖茶厂十分兴旺”^⑪。嗣后的材料也显示:“汉口的四家大砖茶工厂的营业都非常兴旺。”“这几家工厂都装备着现代化的机器,雇佣中国工人数千人”^⑫。

俄商在汉口设立砖茶厂后,又向九江、福州拓展业务。1875年,《海关关册》有言,九江砖茶出口比上年增加,“增多的原因由于在俄国商人管理下的一家砖茶厂在是年春天建立并开工了”^⑬。这是九江新泰砖茶厂^⑭。顺丰砖茶厂也在九江设立了砖茶厂。《中日商埠志》载:“莫尔尼考夫(D.M.Melnikoff)是九江的顺丰砖茶厂(Litvinoff & Co)的经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厂,建立至今已三十年之久。”^⑮1882年,“本埠已建立了第二个制造砖茶的俄国工厂”^⑯。这个工厂应该是九江顺丰砖茶厂^⑰。总计,九江俄商砖

①《海关关册》,1865年分(下篇,第40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4页。

②《海关关册》,1869年分(下篇,第21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4页。

③《海关关册》,1871年分(下篇,第55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5页。

④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5页。

⑤《海关关册》,1876年分(上篇,第64页),总论。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6页。

⑥《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15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7页。

⑦《海关关册》,1878年分(下篇,第42—44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8—49页。

⑧《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269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1页。

⑨《海关关册》,1881年分(下篇,第8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2页。

⑩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5页。

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7页。

⑫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7页。

⑬《海关关册》,1875年分(下篇,第112页)九江。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61页。

⑭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37页。

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62页。

⑯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62页。

⑰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795页。

茶厂最多时“工厂有三所,其产额年年在增加”^①。

福州是俄商投资茶厂的另一地点。1872年,俄商福州砖茶厂建立。1873年,在建宁建立了第二家俄商砖茶厂。1874年,在西芹建立了第三厂,1875年,“俄商又在离建宁不远的南雅口增设了一个新厂;而另一家俄商也参加了这个行业。”^②该年,所有福州地区的俄商砖茶厂为:西芹2个厂,南雅口1个厂,建宁府2个厂,福州南台2个厂,共计7个俄国砖茶厂。由于当地民众的反抗,俄商砖茶厂作了调整,福州、太平各建1个砖茶厂,建宁2个砖茶厂分别迁往南雅口、三门。这样,1876年俄商茶厂共有9个,即西芹2厂,南雅口2厂,太平1厂,三门1厂,福州南台3厂^③。1881年,阜昌洋行西芹砖茶厂失火被焚^④。福州俄商砖茶厂数量虽多,但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设备差,直到1886年才“有一家俄国公司使用蒸汽机械加工制造砖茶了,现在又有一家正在准备使用蒸汽机械,以便把砖茶做得小一些,美观些”,且俄国商人“把他们在这里(福州——引者)开设的企业,主要当做他们在汉口开设的企业的附属机构”^⑤。

砖茶生产的繁荣突出表现为俄商砖茶生产的繁荣。砖茶生产与贸易原本为晋商所控制,“这种贸易全部由中国人掌握”^⑥,但俄商投资砖茶工业后,不但“茶叶贸易,总起来说,主要是掌握在俄商手中”,而且,“制茶业仍由俄国人经营。他们办的砖茶厂十分兴旺”^⑦。俄商能够垄断青(米)砖茶生产并不是偶然的,主要由三大原因决定。“夫俄商之所以能操纵砖茶贸易者,盖有其特殊情形在焉:(一)按同治元年(西历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贩运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领有该领事官发给执照,沿途不再重征,便利实多。(二)洋商在华经营茶叶,势须雄厚资本以及建设工场及开办茶行之用,此外运输华茶至俄商销售,亦须长期垫款,方足有济。(三)陆路途程,固须熟习,所操言语,尤应娴谙,始免债事。查当时中外商民,具有上述必须之资格者,除俄商外,可谓绝无,因之俄商对于此项贸易,遂得独享厚利焉。”^⑧“在砖茶工业这个既关乎茶农利益(农业)、又关乎贸易增长(商业)的中间地域,张之洞却始终未能有效地打破俄商的称霸地位。”^⑨“俄国人的砖茶工业独占鳌头,无可企及”^⑩确是实情。

综合上述材料及研究内容可知,与华商砖茶厂相比,俄商砖茶生产具有以下三大鲜明特点。

一是俄商砖茶厂数量多,实力强。俄商砖茶厂设立时,非常注意原料供给。早先在羊楼洞茶区设厂制造砖茶,就考虑到该地距大茶市中心汉口不远,交通方便,特别是产区一带及其湘北、赣西北的临湘、修水红茶丰富,原料茶红茶末容易得到保证。俄商后来在九江设厂前,也曾派了外国雇员驻在宁州收茶。这样,九江砖茶的输出大增,从1867年的129254磅增至1870年的329979磅^⑪。俄商到福州设厂时,将大部分砖茶厂也设在产区,设在福州南台的砖茶厂1875年有2个,其他5个厂设在西芹、建宁、南雅口。1876年,俄商砖茶厂只有3厂设在福州南台,西芹2厂,南雅口2厂,太平1厂,三门1厂^⑫。而且九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63页。

② 《海关关册》,1875年分(下篇,第189—199页),福州。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8页。

③ 《海关关册》,1876年分(下篇,第78页),福州。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8—59页。

④ 《北华捷报》1881年10月4日,卷27,第343、第351页。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9—61页。

⑤ Commercial Reports, 1886年,福州,第7—8页。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1319页。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0页。

⑦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7页。

⑧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3—1214页。

⑨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94页。

⑩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39页。

⑪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61页。

⑫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9页。

江、福州本身就是著名茶市和红茶外销中心。汉口的俄商砖茶厂最多时达6个,九江俄商砖茶厂最多时为3个,福州俄商砖茶厂最多达9个。这些砖茶厂基本是顺丰、阜昌、新泰三大公司设立的,特别是汉口俄商砖茶厂,不但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茶叶加工厂,也是近代中国外商投资的大企业。这些工厂,雇佣中国工人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采用现代化的机器进行生产。如汉口顺丰砖茶厂“年产量达150000筐,每筐约重一担半。它使用最新式机器,雇佣工人约八九百人,昼夜开工。”^①按这样的产量,年产量为225000担。汉口阜昌砖茶厂规模最大,“使用职工1300余名”,^②最多时达2000人,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科伦坡、莫斯科都有分支机构^③。汉口新泰砖茶厂,“惟该栈所用机器,皆属新式”^④,以上3厂,资本雄厚,每厂资本约计均在一百数十万两至二百万两白银之间。各厂年制红绿茶砖数额颇大,至少亦在十数万担以上^⑤。据1906年调查,顺丰资本百万两,日产砖茶768担,年产276480担。新泰资本百万两,日产砖茶284担,年产138240担。阜昌资本200万两,日产256担,年产92160担^⑥。3厂合计资本超过400万两,年产砖茶达506880担。1892—1901年《海关十年报告》报道:“俄国租界有两家砖茶制造厂,另两家在英国租界,这是本埠最重要的工业机构了。”“以往十年通过海关出口的砖茶和茶饼,共值银26415574两。现在四个厂共有砖茶压机15架,茶饼压机7架。前者日产120筐,后者日产21筐。砖茶每筐64至80块,每块用压坚的茶末二磅许,茶饼每筐408—504片,每片重四分之一磅。”^⑦

二是俄商砖茶厂设备先进,工艺新颖。俄商砖茶厂的生产工艺、设备也有一个逐步更新的过程,但基本是从羊楼洞产区迁往汉口时,就逐渐使用机器生产,到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机器制茶,成为近代中国率先实行机器制茶的行业。这一更新过程,不仅是机器代替手工的质变,也是制茶工艺的巨变。蒸汽机代替旧式压制茶具有巨大优越:一是效率高,“生产成本无疑地是大大降低了。”^⑧二是质量好,由此带来的效益更为巨大。如:“手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25%是废品,而蒸汽机压机每天出茶砖80筐,只有5%的废品,并且,由于采用机器而节省的费用,每筐计达银一两,以上述产量计,每天可节省银80两,或英镑20镑。”^⑨由此可见蒸汽机压制比手工压有巨大的优势。1878年的《海关关册》显示:“用蒸汽机压制茶砖,在各方面都已证明是很成功的”,“机器茶砖,正如所预料的,是比手压茶砖较为整齐,较为坚实,也较能耐旅途颠簸,最后到达西伯利亚目的地,途中很少损坏。旧法压制的茶砖,由于压力不够,总是在边上有些破损,西伯利亚人重视茶砖外表,很容易理解,完整无缺的茶砖是会立即受到欢迎的”^⑩。汽压机所制茶砖更受蒙古人欢迎。“缘蒙古民族,游牧为生,居处无恒,因是制茶为砖,即便于携带,且具有货币性质也”。“按机器所制之砖茶,较用旧法所制者,坚固异常,而难于碎裂,以之权作货币,流通能力更大,蒙古及西伯利亚人极为欢迎”^⑪。

1878年,俄商采用水力压机代替蒸汽机压制,以解决香味损失问题。因为“新旧两法制造茶砖,都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即蒸润茶末时把香味全都蒸掉了”。而改用水力压机后,“做成缩成波状的小茶饼,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5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7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4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6页。

⑤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第29页。

⑥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849)》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编辑室,1984年,第25—26页。

⑦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上篇,第304页),汉口。

⑧ 《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269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1页。

⑨ 《海关关册》,1878年分(下篇,第42—44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0页。

⑩ 《海关关册》,1878年分(下篇,第42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8页。

⑪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13页。

每饼重四分之一磅,茶叶新鲜,原有的芳香都保存住了”^①。1879年,俄商砖茶厂又试验了哥德龙法(Goodern process)压制干茶成大小适宜的茶砖,以解决蒸润茶末的香味损失及将茶砖留在模子里很久、又要慢慢蒸发水分,“因而严重地浪费了时间、空间和材料”^②的问题。

三是俄商砖茶厂产品丰富,以青(米)砖茶为主。俄商砖茶厂的产品基本上以青(米)砖茶为主,数量要占到砖茶产品的绝大多数,但具体比重是多少?则不得而知。下列5种砖茶,第一、第二种是青砖茶,第三、第四种是米砖茶,只有第五种,即药茶砖与一般青砖茶有所区别,但其实也可归入青砖茶之列,只不过是砖茶原料中增加了药材而已。

第一种砖茶较大,用次等绿茶(即黑茶,绿茶砖原料就是老青茶)制造。茶砖重3.5磅,长1呎4分之3吋,宽7吋,每篓装36块。此种茶成本每篓4两5钱或1英镑7先令。这种茶年出1.5万至2万篓,市场为西伯利亚西部和西北部、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省、吉尔吉斯人和其他鞑靼民族。

第二种砖茶也是绿砖茶,质量较好。每块重1.5磅,长8又1/4吋,宽5又1/4吋,每篓装80~90块。价格每篓5两5钱,或1英镑13先令。市场为西伯利亚西部和西南部、喀山、阿穆尔一带。

第三种砖茶用红茶末做成的红砖茶。每块重2.25磅,长8又1/2吋,宽6又1/2吋,每篓装64块,每篓的价格是6两,或1英镑16先令。这种茶市场为西伯利亚各地的农民、俄国欧洲部分东部的农民。“这种砖茶是福州、九江和汉口加工制成。这三个地方的年出口量大概是100000篓”^③。

第四种砖茶是小京砖茶,用质量最好的茶末制成。它的制造方法是将每块2.5磅的干茶末,不用蒸便倒入汽缸上的钢模内,每块承受2吨压力,取出后用锡箔,然后用纸包装,最后装入有铅皮的箱子里,全部运往俄国。1892年,九江一家俄商砖茶厂垄断了这里的小京砖茶制造。“小京砖茶甚至供销俄国国外的市场——德国和法国”,这种茶被说成是“旅行家、边疆地区的居民和战地的军队的最好的和最便于饮用的茶叶”^④。

第五种砖茶是药茶砖,由粗茶叶、茶茎加上各种药料混合而成。此种茶每包64斤重,每担值银5两^⑤。

这几种砖茶,汉口均有生产。九江只生产红砖茶、绿砖茶、小京砖,福州仅生产红砖茶。

近代中国砖茶业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俄商砖茶业的繁荣。在俄商砖茶厂的压迫下,中国茶商的砖茶生产虽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到19世纪90年代已趋不振。“至九十年代时中国市场完全受其控制”^⑥。

(二)华商情况

华商在羊楼洞茶区、汉口、九江、福州也设有一批砖茶厂。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砖茶区是青(米)砖茶生产的大本营,这一带设有大量茶庄制销青(米)砖茶。19世纪70至80年代,外销商人纷纷竞相来羊楼洞设立茶庄,数量接近上百家之多。那时,“运茶的独轮手推车川流不息;肩挑贩运,络绎不绝。小小的羊楼洞镇,居民曾达两、三万之多。仅茶叶贸易一项,早在咸丰五年,这里的茶厘总局,年收茶厘即达二十余万两之巨。当时,人们就称羊楼洞为‘小汉口’。”^⑦比较著名的砖茶庄有三玉川、巨盛川、广昌和、振兴茶砖总厂、长盛川等。三玉川、巨盛川是羊楼洞见之于记载的最早的砖茶庄,设于19世纪中叶前,用于手工压制长方形砖茶。三玉川资本较多,规模较大,巨盛川次之。这两家得到旅蒙最大茶商字号大盛魁商业资本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经营历史有近百年之久。广昌和系山西人刘辅堂开设。振兴茶

①《海关关册》,1878年分(下篇,第42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8页。

②《海关关册》,1878年分(下篇,第42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1页。

③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18—1319页。

④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21—1322页。

⑤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0页。

⑥[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第55页。

⑦赵李桥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洞茶今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

砖总厂,1909年设立,为日本农科留学生归国者万国梁创办,资本69.6万元^①。长盛川经营10余年,1933年停业。1891年前后,晋商始用蒸汽机、水压机。

汉口是华商经营砖茶的又一地点,厂商以兴商公司最为著名。该公司的前身兴商茶庄诞生于羊楼洞。《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1936年第5期刊载陈启华《湖北羊楼洞之茶》,显示:“羊楼洞之有茶号,远在百二十余。”“光绪初年始设厂压砖,此后以茶叶销路甚广,俄国遂招人包办,其时承包者多为粤商,所以称为洋庄茶厂。最盛时在光绪末年,共有惠昌、新泰、顺丰、阜昌、兴商等五家”。这样,可以推断出1816年左右已有兴商茶号,1874年左右设厂压制砖茶。而《安徽实业杂志》1917年第6期《汉口茶商答复俄员之详情》载:“若言砖茶厂设于羊楼洞、聂家市、咸宁等处,汉口则有兴商公司开办六十余年之久。”^②从中推断,兴商砖茶厂创办时间约为1856年。但无论如何推断,兴商公司的前身诞生于羊楼洞的兴商茶厂,设立时间为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中国茶业的大发展时期。兴商公司搬至汉口的时间、地点,史料记载也很混乱。“兴商砖茶厂,1907年设立,所在地武昌,资本500000元,工人数400”。“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华商始有兴商茶砖公司之组织,自制茶砖,规模亦颇宏大,初有资本二十五万两,后仍扩充至五十五万元”。“兴商砖茶厂,经营者中国人,所在地汉口玉带门,设立期1908年,资本60万两”。“兴商茶砖厂为粤商组织,经理为唐文山,成立于光绪末年,于今(1925年——引者)近十年矣”^③。现在还只能说,兴商公司在光绪(1875—1908年)末设于武汉,使用机器制茶,其他情况不太了解。

九江、福州也设有华商砖茶厂。1875年,九江设有俄商砖茶厂,即九江新泰砖茶厂。《海关关册》记载,1867年九江出口砖茶129254磅,1868年降低三分之二,1869年无出口,1870年为329979磅,1874年是93479磅^④。这些出口砖茶早于九江俄商砖茶厂的设立时间,当为华商砖茶厂制造的,但具体情况不明。

福州的华商砖茶厂首先是买办建立的。1874年,“一个外国洋行买办也经营起砖茶业,在福州成立一个新厂”。1875年,华商砖茶厂发展到3家,分别是西芹1厂,建宁1厂,福州南台1厂,1876年只有三门有1家华商砖茶厂,19世纪70年代已向机械化过渡,虽然“中国人也开始办厂和外国商人竞争”,结果并不理想,“但是外国商人的厂仍然很稳固”^⑤。1910年,致和砖茶厂成立于福州,资本15万元,是购买俄商砖茶厂而设立^⑥。

此外,1872年,英商砖茶厂在汉口成立,详细情况不甚清楚^⑦。19世纪70年代,“俄商开始在福州制造砖茶,另有三家英国商店亦设立砖茶厂”^⑧。具体情况同样不太清楚。十月革命后,俄商新泰砖茶厂改名英商太平洋行所属砖茶厂,得以继续存在。

俄商砖茶厂迁往汉口后,把羊楼洞变成了它的原料供应地。所谓“茶系俄人在汉口制造,名曰华茶,实则利权已入俄人之手”^⑨。羊楼洞的华商青(米)砖茶企业难以与俄商抗衡,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是旧式制砖茶难以与机器制砖抗衡。中国传统青(米)砖茶制作方法沿袭手工方式,连外国人都认识到,俄商砖茶生产机器制造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对手工业者的优势”^⑩。据《湖北羊楼洞老青砖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载:“砖茶庄之制砖方法,初极幼稚,即置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蒸毕倾入斗模内,置

① 佚名:《创设茶砖公司》,《申报》1909年3月15日,第2张,第3版,第99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202页。

② 冯晓光:《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解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8—140页。

③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849)》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编辑室,1984年,第30—31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61页。

⑤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8—59页。

⑥ 《海关关册》,1910年,福州,“福建事情”,第544页。

⑦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0页。

⑧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第54页。

⑨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849)》第1辑,第27页。

⑩ North China Herald, 1887年10月27日, P446。

压榨器中,藉杠杆之力,压成砖形,随即脱模置于室内,任其自干,数日后即可装箱起运。其后由杠杆压榨器改用螺旋式压榨机,制成之砖,较为紧结。近十数年(1935年前之十数年——引者)复有一二茶庄购置锅炉汽压机及水汀装置,设备更较完备,惟规模较汉口茶砖厂为小耳。”^①也就是说,大约1920年前,中国茶商的砖茶生产都沿袭旧式生产。旧式压制砖茶之法无论在生产效率还是产品质量上均难以与机器压制方式相抗衡。“使用蒸汽机来代替手压机,一定会减轻生产的成本,而且产品的质量定会好些。旧法制造的砖茶压得不够坚固,路上辗转运送,到了目的地以后往往便破碎了,便影响了卖价;买的人喜欢坚固完整的砖茶”^②。手工压机的巨大缺点和机器压机的许多优点一对照,就不难理解“用木制压机将茶末压成茶砖的中国旧法,现在(1879年——引者)已几乎全被设在产茶区的工厂的蒸汽压机所代替了”^③的真正原因了。虽然,蒸汽压制代替旧式手工压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必须使用昂贵的机器设备,这是一般茶庄商人难以承担的。因此,受其资金制约,中国茶商的生产方式一直以手工压制砖茶为主,即使在清末民初时期有些变化,但购买机器的商人毕竟不多,整体上并没有改变砖茶生产的固有格局。

二是旧式茶庄难以与俄国公司抗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不久的汉口茶叶市场上,出现过英国商人垄断茶叶市场的局面。对于英国在砖茶生产与贸易中的弱势,英国人有些奇怪。对于“近年方兴未艾”^④、兴旺发达的俄商砖茶生与贸易,曾于1872年设太平砖茶厂争夺不利的英国人心有不甘地说:“砖茶业除对我们这里租界的繁荣有所增进以外,我们实际上没有参与,对我们也没有利益。因为,我们和英租界内主要砖茶厂都没有关系。除非看看在印度产茶区我们所创办的制茶工厂,是否能使我们在西藏市场上竞争顺利。”^⑤既然如此,砖茶业中“中国人开始办厂和外国商人竞争,但是外国商人的厂仍然很稳固”^⑥就很容易理解了。事实上,英国设厂都难以撼动俄商砖茶厂的垄断地位,更不要说一般中国茶庄的实力了。在羊楼洞茶区及汉口、九江、福州设厂的俄商砖茶厂,基本都分属于顺丰、阜昌、新泰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它们的资本动辄百万以上,即使号称近代中国最大的砖茶公司兴商公司也难以与之匹敌,更不要说一般茶庄的实力了。资本主义大公司与封建主义茶庄的竞争优势谁优谁劣,泾渭分明,结果也可想而知。在1917年,俄商砖茶厂自动歇业前,中国砖茶的局面完全由俄商控制,这就是历史事实。

三是贸易条件难以与俄商抗衡。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步步加深,外国侵略者越来越疯狂地对中国进行多方面侵略,中国茶商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砖茶的制造几乎全部是为了俄国市场”^⑦,1861年前,“这种贸易全部由中国人掌握”^⑧,“恰克图的市场是由山西的商人供应的,他们在湖北湖南(这两个地名在伦敦茶叶市场上是用粤语称呼的)采购和包装茶叶,并从那里直接由陆路运往恰克图”^⑨。但是,1861年颁布的一项帝俄谕旨,“取消了这项重要的垄断贸易。现在茶叶从海路和陆路都可以进口了”^⑩,俄商抛开晋商,纷纷南下汉口,直接到产区设厂制销砖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当时在通商

①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第18页。

② 《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15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7页。

③ 《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269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1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13页。

⑤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52页。

⑥ 《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269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59页。

⑦ 《海关关册》,1876年分(下篇,第64页),总论。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6页。

⑧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0页。

⑨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7页。

⑩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7页。

口岸,外国人不允许自由活动的,更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设厂。外国人投资设厂的权利到1895年《马关条约》才作出规定,但外国列强根本无视中国的这些主权。“1864年俄国人学会了怎样制造砖茶,在1865年有半数以上的经由天津发往恰克图的砖茶,是俄国人自己在湖北内地加工制造的。这种茶叶的质量比当地的好,因此自从1866年以后,所有运来天津以便转往西伯利亚的砖茶,都是俄国人加工的,或是在他们的监督下加工的”^①。原先恰克图市场上约100个山西行庄只剩下4个老的行庄,“并且他(报告人——引者)认为在这项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②。恰克图贸易名存实亡,恰克图的作用只是茶叶中转站而已。不但如此,“1864年底俄国政府禁止砖茶从西边边界进口,这法令使得砖茶贸易大部分落入本埠(汉口——引者)的专走恰克图的俄商之手”^③。同时,清政府规定,俄商在“蒙古地区不准任意行走,张家口不准设立行栈”^④,但俄商根本不理会,而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在某些限制之下,贸易可以进一步深入到外蒙古的库伦和直隶的张家口”^⑤。这样,俄商将本该运回国内的茶叶销于中国。“毫无疑问,将有许多茶叶从恰克图偷运回蒙古”^⑥。甚至发生俄茶倒灌的现象,即俄商将茶运回国内后,又从俄国销往中国蒙古、新疆等地。在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下,晋商不但失去砖茶销俄的机会,连传统市场中国的大西北也保不住。所以,即使在华商经营茶业的黄金时期,也不是所谓的繁荣至极,只不过仍在努力挣扎罢了。

清末民初,为羊楼洞砖茶生产相对繁荣时期。据调查,“欧战暴(应为‘爆’,原文如此——引者)发,红茶销路,一落千丈,茶农相率改采老茶,故民初以后之数年间,为羊楼洞老茶贸易之最盛时期。当时该镇茶庄全为山西帮所经营,资本雄厚,每庄之资本,常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元者。老茶茶庄数目曾达十八家之多,年产茶砖十七余万箱,约合十五万余担(每担旧秤一百斤)”^⑦。这一段时间,砖茶经营业务较大者,以三玉川、巨盛川、振利茶砖总公司及汉口的兴商公司为代表,其中三玉川、兴商公司的情况较为明朗,兹以此两砖茶企业为例说明之。

三玉川曾名大玉川,因所压制砖茶有三玉川号字,又有几个销茶庄口的字号叫三玉川,因此,此地茶山来往的人也就叫大玉川为三玉川^⑧。三玉川总号在山西祁县县城内,办茶地点为羊楼洞、羊楼司、聂家市。以羊楼洞茶叶质量为好,多半制成二四、三九砖茶。二四砖茶销归化城、包头,产量不多。前后营等处蒙古人特别喜爱三玉川所制三九砖茶,只要有三玉川3个字就信得过。三玉川在归化设有庄口,主要为大盛魁进货。在张家口也设有庄口,只卖恰克图、库伦、多伦设庄的商号。1901—1912年,外蒙古砖茶缺乏时,大盛魁一年销过10000多箱砖茶。三玉川每年派八九人去羊楼洞制茶,小暑冬月回,汉口常驻2人办理运茶、交款等事。大玉川每年在羊楼洞制作三四千箱三九砖茶(每块3斤半)及一二千箱二四砖茶(每块5斤半),在羊楼司、聂家市制作三九、二七、三六茶(每块3斤半)6000至8000箱不等。1910—1911年间,茶庄兴盛时,数量更多。三九茶主销前后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七茶由张家口转销库伦,三六茶由恰克图转销俄罗斯,二四茶销内蒙古西部及青海。上述几种茶也在陕、甘、宁、晋沿长城一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00页。

② 同上。

③ 《海关关册》,1865年分(下篇,第40页),汉口。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第42—43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3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8页。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09页。

⑦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第17页。

⑧ 赵李桥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洞茶今昔》,第5页。

带销售,但数量不多。归化城是三玉川最大庄口,设有庞大机构,各项业务人员总在百人以上,不包括伙计及商人。它设在此地的一个茶厅(栈间),修补运到砖茶的茶匠即有20余人。张家口、前后营、库伦者都是大庄口。由于三玉川牌号出了名,供不应求,羊楼洞的青砖茶就把牌子全部改为川字标记。后来,一些兴办不久的砖茶庄,尽管厂名不带川字,也把所产的青砖茶标上川字商标,一直沿用不变^①。川字牌青砖茶成为羊楼洞茶区的公共品牌。

川字牌的由来与古代圣贤、地名有关,也与赤壁羊楼洞的三股泉水有关。大玉川商号取自宋代的一全套茶具——大玉川。这套茶具取名是为了纪念唐代诗人、茶人卢仝,他自号玉川子。川字商号与山西祁县渠家大院也有渊源。渠家大院门楼顶端有“纳川”二字,代表财富及包容。渠家基业创办人,第十四系渠同海(1723—1789)字百川,乾隆(1736—1796年)中期前往包头发展,独资经营菜园、粮食、油面、茶叶,兼营钱业生意而发家。渠同海以“长源本晋川,荣华万世年”作为孙子辈以下辈分的世系排名。后来渠道在羊楼洞开办的茶庄大都与川字有关。如长源川、长盛川、三晋川、宏源川等茶庄。川字商号也与赤壁别名蕤川有关,巧合的是,羊楼洞观音泉、石人泉、凉荫泉3股天然泉水,流经茶乡古镇时,形成川字^②。不管是哪种来源,最终的事实是,三玉川的川字牌具有持久影响力。“砖茶行销西北边区及内外蒙古一带,历时既久,在绥包同胞方面购买此种砖茶,不须用嘴说,只要竖起三个指头(食指、中指、无名指),虽都知道他是要买‘川字’牌砖茶的”^③。

兴商公司是清末民初最大的民族砖茶企业。《中华实业界》1915年第6期载陶企农《调查皖苏浙鄂茶务记续》一文,对兴商公司有较详细介绍:“汉口茶业有六帮,即山西、广东、两湖、安徽、江西,专以湘、鄂、赣、皖所制之红茶,行销外洋。茶栈除山西帮长盛川、湖北帮彝兴及广东帮之兴商公司三家常年开设外,其余则春来秋去。……兴商公司则专制茶砖,销俄国及蒙古。砖茶尚有三种,一老茶砖,一小茶砖,一米茶砖,纯用机器制造。该公司成本为二十二万,常经费一万二千,机器三部,采买湖北羊楼洞之茶为原料,不足,则以各山之茶补之。厂中规模甚大,自来水、电灯机均自己开。开机一部,用工三百,用煤十吨。若三部齐开,止须人工七百,煤十四吨,愈多则愈合算。老砖每箱四十五块,值银十四五两,小砖及米砖每箱八十块,值银十六两。砖之优劣,以茶之头两三交分等差。装箱时以粗细纸包二层,置篾箱中,以篾箍紧,售于俄人及蒙古。俄复以此运至他处,每箱可获利三十两左右云。该公司开办五年,始而不见发达。近来销至六十万箱,较前虽胜,亦不甚获利。以外人常将印锡茶末运至汉口,制成茶砖,复用原箱运至外洋出售,谓之原箱,出进无税,华人大受其欺。”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兴商公司虽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砖茶厂,但在外商压迫和竞争下,并不占优势,经营状况也并不太乐观。只有到1918年俄商停止砖茶生产后,兴商公司抓住机会,情况才有所好转。据调查,“俄国革命时,俄商阜昌,顺丰及新泰等洋行,皆因政权改变,私人不能经营商业,相继停闭。该公司得以乘机惨淡经营,营业颇佳;每年除自制茶砖二三万担以外,尚兼代他人制造,年获盈余颇丰。”^④这或许是兴商公司经营最为辉煌的时期,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最终也难逃衰落的命运。

① 《旅蒙商大盛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2辑,1984年内部版,第45、第90页。并参考王艺:《羊楼洞青砖茶》,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湖北省志资料选编》第1辑,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第150页。李漪云:《大玉川茶庄》,《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② 冯晓光:《川字牌的四种由来》,《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解密》,第123—124页。

③ 茶人:《两湖砖茶的过去和现在》,《中国茶讯》1951年第3期。

④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第29页。

三、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衰落的原因

中国砖茶生产的衰落以1917年为标志,大体延时到20世纪20年代初(1923年)。衰落的原因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湖北实业月刊》1925年第4期对此作了概述:“茶砖既专销俄国,砖厂亦多为俄人所经营,近八九年来,俄国内乱不息,茶商全体停顿,茶砖厂亦完全停工。”^①具体而言,近代中国砖茶业由盛转衰的原因大体有三大方面。

(一)外销市场丧失

砖茶外销向以俄国为大宗,占中国砖茶外销总量的99%以上,有时候甚至占到100%。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局势动荡。继则,发生14国武装干涉及邓尼金、高尔察克等白匪叛乱事件,人民连生命、生存都难以得到保障,当然就不可能消费更多的茶叶,因而砖茶顿失俄国市场。砖茶丧失了俄国市场,就等于失去了砖茶国际市场,也就等于没有了国际销路。砖茶出口俄国一般每年为30万~40万担,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极盛时期。1915年砖茶出口俄国竟有641110担,达到近代中国砖茶出口最高峰,翌年旋即下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只存74641担,1920年竟只有8340担。嗣后数量虽有回升,也仅2万多担,1923年更跌至6450担,几乎只有最高峰时年出口俄国数量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砖茶核心市场基本丧失,砖茶生产失去动力,停产就是必然的事^②。

(二)俄商砖茶厂停产

从同治(1861—1874年)光绪(1875—1908年)直至20世纪初,中国砖茶生产的繁荣并不代表砖茶生产的客观现实和本质。因为俄商砖茶生产的繁荣,建立在对华茶掠夺和压榨的基础上,是一种经济残酷侵略的体现。这种生产越繁荣,就越意味着华商砖茶厂的厄运。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代表俄国资产阶级侵略利益的俄商砖茶生产失去旧的经济基础,其撤离中国当然是历史的必然。汉口俄商阜昌、顺丰、新泰砖茶厂相继关闭(福州、九江俄商砖茶厂早前已经停产)。于是中国砖茶生产的虚假繁荣不复存在。

(三)华商砖茶厂并未复兴

当然,俄商砖茶厂这项压在中国华商砖茶厂头上的帽子被掀翻,也并不代表华商砖茶厂从此发展就一帆风顺了。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能得到改变,砖茶生产、贸易受制于外人的局面也丝毫不会改变,华商从事砖茶生产的外部环境并未改善,其复兴也只是徒增空想而已。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表2 20世纪20年代中国砖茶生产中心湖北蒲圻县砖茶厂生产情况一览表

砖茶厂名	长盛川	大德生	兴隆茂	宝聚兴	三玉川	天顺长	巨贞和	巨盛川
男女工(名)	226	198	256	172	249	301	427	398
每年制茶砖(箱)	5000	3000	4000	3500	4000	4500	4800	3000
值洋(元)	75000	45000	60000	52500	60000	77500	7200	45000

资料来源:《湖北全省实业志》卷3,1920年,第89—91页。

从上述表格可见,1920年左右的中国砖茶业制造中心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的砖茶生产情况根本谈不上繁荣。虽然从统计表来看,砖茶厂数量还有好几家,但各厂砖茶产量及产值均比较少,说明砖茶厂力量薄弱,无力复苏。这说明,俄商砖茶厂停产后,并没有换来华商砖茶厂的复兴,中国砖茶生产仍然

①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31页。

② 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8—101页。

处于萧条之中。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繁荣的原因,二是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繁荣的具体内容,三是剖析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衰落的几个方面。中国砖茶生产的衰落以1917年为标志,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1923年)。大体来说,近代中国砖茶业由盛转衰,一是外销市场丧失,二是俄商砖茶厂停产,三是华商砖茶厂并未复兴。

通过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盛衰的研究,为当前中国青(米)砖茶生产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很重要。企业规模、生产能力及效率是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俄商砖茶厂之所以能够竞争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它对小工厂尤其是作坊式生产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说明只有现代化生产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第二,改进生产工艺很重要。俄商砖茶厂之所以能够竞争成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工艺不断提高,能够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俄商砖茶厂起初也采用手工制造,产品的质量相对逊色,但在采用机器生产后,产品的质量得到很大提高;与此同时,生产工艺与时俱进,生产的产品更受市场欢迎,这是俄商砖茶厂竞争成功的强大驱动力。第三,达到产销协调很重要。俄商砖茶厂的生产建立在拥有广阔的市场基础之上。俄国市民大量消费砖茶,中国西北市场也大量销售砖茶,俄商生产的砖茶不但直接运回本国,做到产销有机衔接,而且还大量销往中国西北地区,广阔的销售市场刺激了俄商砖茶厂的生产,推动了俄商砖茶厂的发展。

当前,随着“万里茶道”研究热的兴起,中国砖茶生产理应顺势而上,奋发有为,努力扩大传统市场,不断开拓新的市场,进一步做好产销结合工作,为当代中国砖茶生产的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特别鸣谢: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不吝指教,提出详细而具体的审稿意见,让拙文增色不少。]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参 考 文 献]

- [1] 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2]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M].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
- [3] 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4]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M].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
- [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849)(第1辑)[M].武汉:湖北省志贸易编辑室,1984.
- [7] 渠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初稿)[M].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 [8] 陈 钧,任 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